

玄学对魏晋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曹凯成[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 广东 江门 529000]

摘要:曹魏正始时期,在何晏、王弼等人的作用下,玄学迅速成长为影响士人的哲学思想。正是在玄学思想的作用下,魏晋士人的诗歌创作观念发生较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诗歌创作中“重情”思想的显现;二是诗歌创作走向自然、山水;三是游仙诗的开拓;四是玄言诗的出现。玄学思想的出现,为魏晋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玄学 魏晋士人 诗歌创作 影响

玄学思想兴起于正始时期,它以一种不同于儒学传统的姿态在魏晋士人中传播开来,不仅影响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使得士人们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影响到了魏晋士人的诗歌创作。学术界目前对玄学的研究或是针对玄学与佛、道理论形态的关系研究,或是集中于魏晋士人的玄学思想之比较研究,抑或是聚焦于玄学与魏晋士人诗歌创作的个体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研究玄学影响魏晋士人诗歌创作的论文较少。因此,从玄学这一角度对魏晋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玄学思想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一、玄学的产生与发展

道学复兴,儒学衰弱,这个历史趋势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自董仲舒以来的儒家思想已经难以维系社会的统治,出现了学术思想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到了三国时期,曹魏政权衰落,司马氏家族逐渐掌权,大肆屠杀异己,正如《晋书·阮籍传》载:“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大批正始名士正是在如此黑暗的统治中求生存,由于他们难以认同司马氏政权,于是他们远离政治,谈玄论道,想要寻找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宇宙、协调社会、思考人生。玄学作为道家在新时期发展的新形态,使得魏晋士人的精神境界得以解脱,形体得以解脱,个性受到尊重。以儒家思想为底色的士人在面对现实残酷时,内心不仅担忧自身的生存安全,还同样面临无法济世的矛盾,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下,有能够让他们的内心得到暂时的慰藉或者解脱的思想资源,都足够让他们争相推崇。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正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受到魏晋士人的推崇,玄学遂得以蓬勃发展。玄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以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为代表,他们提出“圣人体无”“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虽然他们提出了此种玄学命题,但是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的作品却很少具有玄学色彩。在这个阶段,魏晋士人以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出发,并不着重探讨万物的发生和演变,而是认为万物存在的本质是“无”。《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思想演化而来,而这也成为其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成为魏晋玄学发展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从根本上否认儒术。《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放诞不羁,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玄学思想,以“自然”观念对抗着司马氏政权“名教”观念。他们将玄学思想融入诗歌作品中,对所谓的“礼法之士”展开猛烈攻击,而这也恰好为正始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西晋时期,玄学发展到第三阶段,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人物,提出“名教即自然”的哲学命题,他们认为儒家与道家、人伦与自然是契合统一的。向秀认为人的本能是自然,如何能让这种自然属性合理化?那便需要以礼进行节制。郭象将天地万物的本质属性归纳为自然,当然名教也不例外,所谓自然,就是无为、独化。东晋时期,玄学发展到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以张湛、韩康伯等为代表人物。张湛《列子注》主张“任自然而顺名教”,进一步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应将名教与自然进行有机结合。此外,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这一时期佛玄合流思潮逐渐兴盛,在上层

士族、社会精英中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玄学得以进一步发展。

二、诗歌创作中“重情”思想的显现

汉代大一统时期,统治者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以社会为中心,以至于两汉文学以“重礼”为主要趋势。到了汉末,统治的崩溃、社会的混乱以及现实的残酷,导致儒家地位衰落,催生出那个时代士人内心对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追求,以至于文学不再以社会为中心,诗歌也从群体诗学向个体诗学转变。“情”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的内在动力,由于文学中“人”地位的提高,“重情”自然成为魏晋诗歌的必要属性。“情”成为玄学最重要的问题,主要通过“圣人有情无情”这一问题表现。魏晋士人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辩论,可以追溯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何晏首倡“圣人无情说”,但何晏关于“圣人无情说”的具体论证,没有流传下来。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说:“圣人无情乃汉魏间流行学说应有之结论,而为当时名士之通说,圣人无情之说,盖出于圣德法天。此所谓天乃谓自然,而非有意志之天。”汤先生认为何晏等人的“圣人无情论”是以顺应自然为依据,并非单纯说圣人无情。王弼则主张“圣人有情说”,《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载:“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王弼认为圣人也是有喜怒哀乐的,但是圣人之情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圣人会以礼治情,不会为情所困,以达到情与理和谐统一的状态。由于文学被人赋予了其他的政治功用、社会责任,“情”在文学中被掩埋,而顺应时势发展起来的诗歌,表情最丰富、蕴藉的诗歌体式得到迅速发展,“情”在玄学的推动下重新焕发生机。

“重情”是“玄学”的自身属性,是士人追求个性自由、强调自我的体现。而这种重情风尚,在魏晋士人的诗歌创作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魏晋诗歌常以第一人称视角描写,诗中主体意识的增强,更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情感抒发也更加强烈、顺畅。潘岳《悼亡诗》三首所表达的对妻子杨氏逝世的哀悼及思念,更是“安仁情深之子”的深刻体现。陈祚明评价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

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左思《娇女诗》一改往日风格,诗人以一种半嗔半喜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性格,字里行间饱含着父亲对两个女儿深沉的爱。魏晋士人无论对亲人、对爱人还是对朋友,都因为意识到强烈的自我,而将深厚的情感蕴藏在诗歌创作之中,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魏晋士人的重情风尚。在玄学的影响下,“重情”风尚在诗歌创作中成为主流,立足于内心创作的诗歌越来越多。玄学思想中“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论题,在何晏、王弼的论述中逐渐明晰:圣人虽德合天地,而不能不应物而动;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而“圣人有情”的基本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士人的认可。“圣人有情”说影响到诗歌创作中,促进了“重情”风尚的盛行。诗人之“情”充盈于诗中,诗中主体意识的增强,拓宽了诗歌中诗人的精神世界,也呈现出诗风个性化十分明显的特点。

三、诗歌创作走向自然、山水

《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两人皆认为“无”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亦是宇宙存在的本质。两人同时认为,自然是国家、社会运行的最佳状态,只有遵循自然,万事万物才能够周而复始,往无穷极。玄学一方面使诗人任情率真,追求真性情,对自然山水十分推崇,例如西晋“鲁公二十四友”常于金谷涧中集会,游玩唱和,创作了《金谷诗集》,而东晋的兰亭集会,也与之类似;另一方面使得诗人多淡薄宦情,冥于自然。正始时期,阮籍通过玄学的思想方法写诗,将诗风由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阮籍巧妙地利用“象”既模糊又明晰的特性抒发情感,由“象”至“意”。阮籍《咏怀诗》其一云:“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清风、明月、鸿号、鸟鸣以动写静,写出了周围寂静清冷的自然环境。西晋时期,左思《咏史》其二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诗人通过自然景象的描写隐喻了人间的不同,委婉含蓄,形象鲜明。东晋时期,谢混《游西池》云:“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置身于大自然当中,诗人将西池的美景一一描画出来,飞霞、惠风、白云、景昃、水木,远近之景尽收笔下,动静结合,充满了乐趣。湛方生《帆入南湖》云:“白沙净川路,青松

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诗人除了流露出对游山玩水的愉悦心情外，还涉及玄思，此山此水起自何时、来自何方呢？诗人后来想明白了，自然山水不会因人事代谢而变迁，会按照自然规律长久地永恒下去。其实，随着玄学的发展，魏晋士人关于自然、山水的描写已不再是单纯模山仿水，而是渗透了“道”的意味，使得这一时期的自然、山水诗作越来越富有玄学的特征。

四、游仙诗：与玄学相结合，拓宽了游仙诗的主题

游仙诗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楚辞《远游》和秦朝《仙真人诗》，由于此时玄学并未出现，所以其主题思想受老庄学说或燕齐神仙之说影响颇多。汉魏之际，老、庄学说复兴，曹操、曹丕父子继承了以前游仙诗的创作传统，依旧表现出修仙得道、求药长生的思想。曹操《精列》云：“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诗人期望能到海上去看看蓬莱仙山，以期求得长生。曹丕《芙蓉池作》云：“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也许曹丕从来就不相信神仙方术之事，可是既然不相信，又为什么要在众多诗中夹杂游仙这种思想呢？至少在曹丕的心中还是想象过长生得道之术。到了曹植，其游仙诗作不仅以访求仙药、延年益寿为主旨，其中还加入了一些新的内涵。曹植游仙诗的内容不再仅限于神仙得道，开始走向诗人因对现实不满，借游仙而抒己志的道路。这样的转变可能与曹植的人生遭际有关，曹植后半生一直处于惊惶不安之中，内心十分压抑，生命受到威胁，与正始时期士人的人生境遇相差不多。“正始时期，天下多故，嵇、阮等玄学家追求超越名教生死、摆脱情欲物累的人生，力避现实，而老庄自然逍遥的精神恰好与之契合。反映在诗歌当中，也是追求一种能够安身立命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此一时期，由于玄学的产生，嵇康和阮籍的游仙诗往往与玄言说理相结合。嵇康有诗云：“羽化华岳，超游清霄。云盖习习，六龙飘飘。左配椒桂，右缀兰茝。凌阳赞路，王子奉輶。婉变名山，真人是要。齐物养生，与道逍遥。”此诗所表现的不仅有对神灵的向往，还有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自身命运的忧心。“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带有很明显的玄学思想，嵇康将游仙与隐逸相结合，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

及对逍遥的隐逸生活的向往。从阮籍、嵇康的游仙诗中，可以看出游仙诗已经成为诗人对现实抨击的载体以及逃避现实祸端的“桃花源”。两晋时期的游仙诗人当推郭璞，其游仙诗作，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评价他说：“《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此外，《文选》注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铄铄纓纓，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这说明了郭璞的《游仙诗》多是其仕宦失意的反映，是抒发自己内心苦闷的一种方式。如《游仙诗》其四：“六龙安可顿，运游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咤。”诗中所描绘的神仙世界恰与诗人现实中所感受到的身体的束缚、生命的短暂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诗人因自己年迈而学仙志愿难偿的悲伤。整首诗虽写游仙，但主题还包括了诗人内心对时光易逝的悲哀。

由此可以看出，游仙诗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诗歌主题得到拓展，诗人内心的压抑苦闷、仕途的不得志、人生的艰难曲折、对神仙世界的向往等在游仙诗中频频出现。魏晋玄学使得游仙诗不再只有寻仙访道、追求长生不老，诗歌内容不仅是描绘想象中的神仙与神仙世界，还可以是诗人以神仙为媒介追求精神的自由，借神仙的逍遥生活来表达对黑暗压抑的现实的不满，抑或是借歌咏神仙来自叙怀抱，辞多慷慨。玄学思想的加入，使游仙诗与隐逸相结合，与现实相对立，赋予了游仙诗新的生机。

五、玄言诗：从诗含玄理到以玄言为诗

玄言诗是魏晋时期出现的新的诗风，它几乎都是阐发老庄旨意的注解，或者直接将诗歌作为清谈论辩的载体，文学艺术价值不高。钟嵘在《诗品·序》中对玄言诗评价道：“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对玄言诗持批评看法，认为玄言诗玄言说理太多，削弱了诗歌的艺术审美。玄言诗出现以前，何晏就试图将玄学思想引入诗中，如其《拟古》：“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虽然诗中具体事物较多，尚未涉

及玄言，却对后来玄言诗的创作颇有启发。阮籍、嵇康的诗作在何晏诗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已蕴含玄理，但还不是成熟的玄言诗。与何晏等人相比，刘勰认为嵇康、阮籍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价值更高。如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诗人心中想着游乐与“太玄”，但是这种领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郎晓斌所言：“玄学在西晋也风靡一时，但这时玄学与魏末时是有区别的。西晋的玄学家们不再热衷于学术探讨和理论阐述，而是追求一种谈吐的飘逸风采和旷达高远的神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陆机、陆云、张华等，他们受到正始玄风的影响，所作的诗多含玄理，包含玄言内容。陆机《招隐诗》云：“至乐非有假，安事澹淳朴？富贵久难图，税驾从所欲。”诗人认为追求富贵名利劳神费力，而且违背自然无为的原则，不如隐居山林，摆脱尘世的喧嚣，淳朴自然。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载：“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聊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沈约认为，玄风畅于西晋，到东晋时期发展到最盛，孙绰、许询等人成为这一时期玄言诗的代表作家。虽说文学作品连绵不断地产生，但是没有不依据老子的哲学，诗赋几乎成了阐发老庄旨意的注解。如孙绰《答许询诗》其一云：“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这首玄言诗，如同佛教中布道的偈语，并不含有太多文学趣味。事实上，随着玄学和佛理的逐渐结合，东晋后期士人们所作的玄言诗几乎很少含有文学艺术色彩，有的只是通过诗歌来辩论玄学义理。玄言诗从玄学产生慢慢发展，直到东晋诗人将玄言诗发展到高峰，成为解玄谈玄的媒介或者载体。由此，玄言入诗发展到极端，最后走向衰落。虽然玄言诗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诗歌的文学性，但是也为以后哲理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总之，玄学思潮不仅影响了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而且使魏晋文士的诗歌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诗歌创作中重情思想的显现，纵情山水、寄予自然的写景之作，游仙诗主题的开拓，玄言诗的出现，为魏晋诗歌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孔繁. 魏晋玄学和文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2] 房玄龄等. 晋书(第五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张伪之. 世说新语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5]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
- [6] 陈寿. 三国志(第三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 采菽堂古诗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 房玄龄等. 晋书(第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 陶士云. 玄学观照下的魏晋文学嬗变[D]. 东北师范大学，2009.
- [10] 钟嵘. 诗品[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 [11] 萧统编，李善注.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2] 郎晓斌. 玄学与玄言诗[J].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1).
- [13] 沈约. 宋书(第六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曹凯成，文学硕士，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教师。

编辑：赵斌 E-mail: mzxszb@126.com